

《楚辞》研究（下）

河南大学学人文丛

孙作云文集

河南大学出版社

卷之三

三

《楚辞》研究（下）

河南大学学人文丛

孙作云文集

河南大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孙作云文集·第1卷,《楚辞》研究(上、下)/孙作云著.
—开封:河南大学出版社, 2002.1
(孙作云文集;第1)
ISBN 7-81041-730-4

I. 楚… II. 孙… III. ①孙作云 - 文集②楚辞 - 文学研究 - 文集 IV. I207.2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1) 第095333 号

书 名:孙作云文集(第1卷)《楚辞》研究
作 者:孙作云

责任编辑:王芸 刘小敏

责任校对:李梁

责任印制:苗卉

封面设计:张胜

版式设计:冯爱莲

出 版 河南大学出版社

地址:河南省开封市明伦街 85 号 邮编:475001

电话:0378 - 2864669(事业部) 0378 - 2825001(营销部)

网址:www. hupress. com E-mail:bangong@ hupress. com

经 销 河南省新华书店

排 版 河南第一新华印刷厂

印 刷 河南第一新华印刷厂

版 次 2003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3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开 本 650mm × 960mm 1/16 印 张 53.25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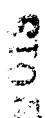
字 数 713 千字 插 页 8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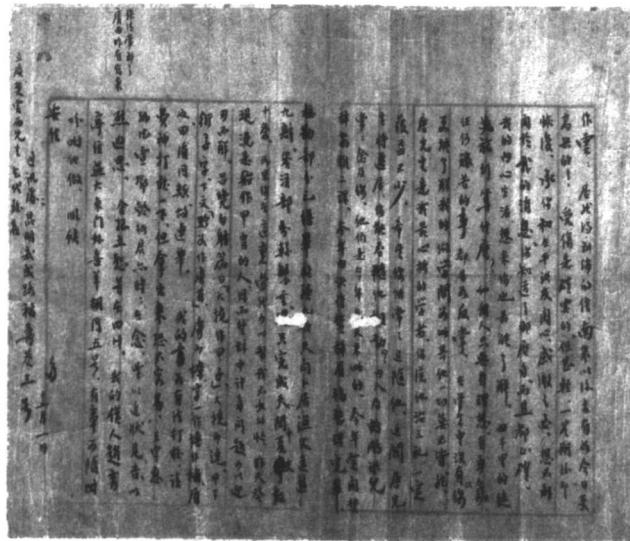
印 数 1—1000 册

ISBN 7 - 81041 - 730 - 4/K · 279

定 价:66.00 元

(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河南大学出版社营销部联系调换)







目 录

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说《九歌·东皇太一》为迎神曲 | (385) |
| 《九歌》湘神考 | |
| ——二女传说之分析 | (394) |
| 《九歌》东君考 | (443) |
| 《九歌》司命神考 | (460) |
| 汉代司命神像的发现 | (471) |
| 《九歌》山鬼考 | (474) |
| 《天问》的写作年代及地点 | (512) |
| 从《天问》中所见屈原的唯物论思想 | (517) |
| 《天问》对于上古史研究的贡献 | (523) |
| 《天问》的表现形式 | (534) |
| 《天问》的错简 | (542) |
| 从《天问》中所见的春秋末年楚宗庙壁画 | (548) |
| 评《天问》三家注 | (555) |
| 《天问》今本章次 | (571) |
| 《天问》校正本 | (575) |
| 《天问》意译 | (581) |
| 《天问》新注 | (590) |
| 从《天问》看夏初建国史 | (749) |
| 《橘颂》的写作年代 | (754) |

| | |
|---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《大招》的作者及其写作年代 | (758) |
| 说《招魂》为宋玉招楚襄王之魂 | (772) |
| 谈《惜诵》 | (791) |
| 关于《渔父》 | (803) |
| 《九辩》的写作年代 | |
| ——从重九登高说到屈原被放 | (809) |
| 《九辩》简注 | (821) |

说《九歌·东皇太一》为迎神曲

《九歌》十一篇，其第一篇曰《东皇太一》，其最后一篇曰《礼魂》。歌名曰《九歌》，而篇章有十一篇，因此生出种种异说。

我在《〈九歌〉非民歌说》一文中说：《东皇太一》为迎神曲，等于汉代《郊祀歌》的《练时日》；《礼魂》为送神曲，等于《郊祀歌》的《赤蛟》^①。二歌原不在祭祀九神的“九歌”之内，因此也就解决了这个篇名与篇数不符的矛盾。说《礼魂》是送神曲，王夫之《楚辞通释》已言之，其后踵述者有人，并非自我而发。说《东皇太一》为迎神曲，则偶然未之前闻。顾其时未能畅论厥旨，今再补述如下：

一 从歌词上即可证明其为迎神曲， 与祭祀“太一”无关

《东皇太一》全篇内容皆为迎神之事。先言选择时日，继言主祭者主祭（此点最重要，详下第二节），继言祭品的香洁、音乐的繁衍、女巫的舞蹈，最后结之以“五音纷兮繁会，君欣欣兮乐康”。“君”为“神君”，即扮神之巫，此二句甚合于善颂善祷之旨。综观全文，皆迎神之事，无一语道及“太一”，与《九歌》其余各篇凡祭祀某一种，必盛言此一神之事迹者迥乎不同。因此，单就歌词本身上，已可审知其为迎神

① 见清华大学中国文学会编《语言与文学》，中华书局，1937年版。

曲，与祭祀“太一”无关。

二 《九歌》为楚怀王时郊祀歌，在祭祀时必有主祭者，此主祭者必为楚怀王，亦即本篇所言之“上皇”

《九歌》为楚怀王之郊祀歌，犹如汉武帝时的《郊祀歌》十九章一样，其详具见于《〈九歌〉非民歌说》，兹不赘。

1956年，我在《论〈国殇〉与〈九歌〉的写作年代》一文里，又考证出《九歌》的写作年代在楚怀十七年秋，即公元前312年秋①。原来，楚、秦两国为争夺“商於之地”（今陕西东南部商县至河南西南部内乡县一带山地，为楚、秦两国冲要之区）而发生战争，在这一年的春天大战于“丹淅”（河南西南部内乡、淅川一带），楚国大败，几乎全军覆没，又丧失汉中之地六百里。楚怀王为了“报仇雪耻”，在这一年的秋冬，倾全国之师反攻，大战于蓝田。《九歌》就是在反攻蓝田之前，为了战争胜利而向神祷祀、求神福佑所作的祭神歌。由此可见，《九歌》不但是楚怀王的郊祀歌，而且是楚怀王十七年的郊祀歌。

祭祀必有主祭者。《九歌》既然是楚怀王的郊祀歌，则主祭者自然必是楚怀王，这从常理上就可以推断。

又就《九歌》的内容，先言选择吉日，次言：

穆将愉兮上皇，抚长剑兮玉珥，璆锵鸣兮琳琅。

按照歌词内容的顺序，此三句必指主祭者，换句话说，这“上皇”二字必指主祭者；而自王逸以下一直到现在的学者，几乎无一人不说这“上皇”指“东皇太一”。朱熹《楚辞集注》也说：“上皇，谓东皇太一也。”但因为这几句确乎是指主祭者，所以他又说：“此言主祭者卜日斋戒，带剑佩玉，以礼神也。”到底这“上皇”是指“东皇太一”还是指主祭者呢？朱熹以不了了之。

① 见《开封师范学院学报》1956年第1期。

我以为这“上皇”即指楚怀王。除上文所说理由之外，更主要的根据，是在战国中期大一统局面即将形成之时，各国国王有称“帝”者。楚国在当时是第一等强国，因之楚怀王也可以称“帝”。“皇”字与“帝”意近，又因为本文全篇皆用“唐”部韵，所以称之为“皇”。又“兮”字下不能用一单字，为了凑合字数，又称之为“上皇”。今略为申述之：

在战国时代（公元前 403 ~ 前 221 年），社会的发展已经达到了“天下一家”的地步。既然在经济、文化各方面已经快达到统一的局面，则在政治上的称号也必跟着改变。战国初期，各国相继称“王”（楚国在西周时代已称王），现在，称“王”犹不足以符合这种接近于大一统的事实，因之就有人称“帝”。这“帝”含有统一的意味。在战国中期，即屈原时代，秦、齐两国即曾相约称“帝”。《史记·秦本纪》说秦昭王十九年，即齐湣王十三年、公元前 288 年，“王为西帝，齐为东帝”。后来虽然取消，但取消的似乎是“西帝”、“东帝”这种平分天下的称号，在国内是否仍自称帝，很难说。其实，不但秦、齐两大国称帝，连二、三等国家如赵、燕亦称帝。《战国策·燕策一》称苏代贻燕昭王书曰：

秦为西帝，赵为中帝，燕为北帝，立为三帝，而以令诸侯；韩、魏不听，则秦伐之；齐不听，则燕、赵伐之，天下孰敢不听！

可见在这时候，称“帝”已经不算什么新鲜事儿。既有统一的条件，则改称统一的“帝”号，人人可为，何必秦、齐！何况在作《九歌》之时，楚国还是堂堂的一等强国（楚国从公元前 312 年与秦国两次交战大败之后，才逐渐降为二等国。在这之前，公元前 318 年，楚怀王还在做关东六国的纵约长，率五国之兵伐秦），这时候，楚怀王称“皇”、称“帝”，又有何不可呢？况且，楚国早已称王（在各国称“侯”之时，它早已经称“王”了），在战国时代各国称王之后，它首先称“帝”，也是极有可能的。

证明楚怀王称“帝”，不烦他求，证据就在《九歌》里。《九歌》有一篇《大司命》，祭祀大司命时，祭巫唱道：

吾与君（“神君”，指“大司命”）兮斋（齐）速，导帝之兮九院
(今本误作“坑”，《考异》本作“阮”))！

这两句话，前人皆不得其解。首先说“九阮”，王逸以为是“九州之山”，洪兴祖、朱熹同。我在《〈九歌〉非民歌说》及《〈九歌〉司命神考》两文里皆说：汉代《郊祀歌·天门》篇也是祭祀司命神的①，该篇有“专精厉意逝九阅”之句，颜师古引如淳曰：“阅亦陔也……陔，重也，谓九天之上也。”“九阅”即“九阮”，皆谓“九天”。原来古人相信天有九重，以屈原作品而论，《天问》曰：“圜则九重，孰营度之？”《离骚》曰：“指九天以为证兮。”《尔雅·释诂》：“阮阮，虚也。”《说文》云：“阮，阄也。”“阮阄”犹“廓落”，正是形容天体浑圆、空虚之状。“九阮”既是“九天”，则“导帝之兮九阮”，即是导引帝上九天。这“帝”字，自王逸以下至今人皆谓“天帝”，夫“天帝”永居天府，更何必待人“导”之！又《大司命》为祭司命神之歌，祭司命是为了求长生，上帝长生久视，超越生死，更何必再求长生！又上帝是天上惟一的尊神，更有什么神或人能够导引他？因此，这“帝”决不是上帝，一定是一人帝。《九歌》既是楚怀王的郊祀歌，则此“帝”字一定指楚怀王。这两句歌的意思是说：祭巫要和神巫（大司命）一块儿赶快地导引楚怀王上九天，使之长生不老。古人相信：人是可以上天的，特别是有“法力”的国王。屈原在《离骚》、《惜诵》中皆曾言己身浮游九天。这个“帝”字既指楚怀王，可见楚怀王也称“帝”，与秦昭王、齐湣王同，并且可能还在他们之前。

“上皇”既指楚怀王，则说此篇是祭祀东皇太一的，更把此迎神曲题名为“东皇太一”，便完全失掉了根据。

说“上皇”是指楚怀王好像有点杜撰似的。假若你认为“怪”，那实在是受了旧说的束缚，有了先入为主的成见。假若你非要我找出一个书本上的证据，证明楚怀王可以称“皇”，则我可以引汉初赋家庄

① 见《清华月刊》1937年第1期。又《汉代司命神像的发现》一文，载《光明日报》1963年12月4日，也可参看。

忌的《哀时命》为证，虽然这个证据不免稍微晚了一点。《哀时命》曰：

灵皇其不寤知兮，焉陈词而效忠！俗嫉妒而蔽贤兮，孰知余之从容！

这四句话无一句不是学屈原的。“灵皇其不寤知兮”，就是学《离骚》中的“哲王又不寤”。这“哲王又不寤”又见于《史记·屈原列传》，曰：“卒以此见怀王之终不悟也。”屈原的话是指怀王的，而《哀时命》作“灵皇其不寤”，亦以“灵皇”指称怀王。由此可见：“上皇”可指楚怀王。

又考此“上皇”三句，大似言楚怀王躬舞于神坛之前。“穆将愉”即肃穆而又愉快，是形容这“上皇”的；“抚长剑兮玉珥，璆锵鸣兮琳琅”，是说这上皇抚摸着他长剑上的玉珥（剑柄饰物），走动时，身上的佩玉璆然锵鸣。这“璆”字是副词，是形容玉声锵鸣的，而“琳琅”则指佩玉。为什么能使这佩玉“璆然锵鸣”呢？一定是有所动作。说到这里，使我想起桓谭《新论》上所说楚灵王起舞坛前的情况。《新论》曰：

昔楚灵王醉逸轻下，简贤务鬼，信巫祝之道，斋戒洁鲜以祀上帝、礼群神，躬执羽鼓，起舞坛前。吴人来攻，其国人告急，而灵王鼓舞自若，顺应之曰：“寡人方祭上帝、乐明神，当蒙福佑焉。”不敢赴救，而吴兵遂至，俘获其太子及后姬以下，甚可伤！
(见孙冯翼辑本《桓子新论》，中华书局《四部备要》平装本第154册第15页。)

歌中所写“上皇”的动作，很有点像楚灵王。不用说，他们二人都是楚国的国王，他们这样做是有传统的。从这里也可见：这“上皇”一定指人，指主祭者，不指神。

解决了“上皇”问题，就是解决了本问题的关键。由此不但知道“上皇”指楚怀王、《东皇太一》为迎神曲、《九歌》确实是楚怀王的祭神歌，而且还给战国史增加了一条新材料：除秦昭王、齐湣王称“帝”之外，楚怀王也称“帝”。这是战国时代的新事物。

三 说“太一”之祀始于汉武帝，在此以前不应有； 今本《东皇太一》乃汉人之误题

天上的世界是人间世界的反映，在人间尚无统一的人帝出现时，在天上不应该有统一的至上神。天上的世界照例是要比人间的世界晚一步的。

也许会有人反驳：在中国不是很早就有了天上的至上神——上帝了么？商代卜辞中不是已经有了上帝的记载么？是的，在商代已经有了上帝，这是商代已经有了人帝的反映，商代的国王已称“帝”。

但是，我以为中国最早的上帝是反映人间最高的奴隶主的。奴隶社会的国王与封建社会的国王不同，奴隶社会有统一的政权，而封建制度本身就存在着分权、割据的性质，所以这时候的上帝，其权力有衰落的征兆。

西周是封建社会。商代末年的奴隶起义，使商朝这个空前的奴隶主王国崩溃，因之，对上帝的信仰也发生动摇。特别在春秋时代，“礼乐征伐自诸侯出”（孔子语，见《论语·季氏》篇），在人间既已不复存在统一的“天王”，在天上也必然会产生封建割据式的上帝。这时，统一的上帝为各方之帝所代替。关于这一点，《史记·封禅书》和《汉书·郊祀志》都给我们保存了极有价值的材料。《史记·封禅书》说：秦襄公在平王东迁之后，即列为“诸侯”（以前是“大夫”），“自以为主少皞之神，作西畤，祠白帝”。这“白帝”当然是地方性的“方帝”，不是统一的上帝。其后秦文公作鄜畤（在今陕西洛川县），也祠白帝，而史敦以“上帝”对，可见秦国的上帝就是“白帝”。其后秦宣公又增祠“青帝”，秦灵公祭“黄帝”、“炎帝”。总之，在春秋时代，随着封建割据的进一步加强，天上已无复统一的上帝。到战国时，“五帝”已成为人人习知之神。《封禅书》说：

（高祖）二年（公元前205年），东击项籍而还，入关，问：“故秦时上帝祠何帝也？”对曰：“四帝！有白、青、黄、赤帝之祠。”高

祖曰：“吾闻天有五帝，而有四，何也？”莫知其说。于是高祖曰：“吾知之矣！乃待我而具五也！”乃立黑帝祠，命曰北畤。

这“五方帝”乃各国诸侯所妄造，连汉代学者也知道。《汉书·郊祀志》载成帝时匡衡曰：

青、赤、白、黄、黑五方之帝……诸侯所妄造，王者不当长道。
这话是一点也不错的。

随着地主阶级建立了统一的、中央集权的大帝国，这分崩离析的天上的世界也必需相应地加以整顿，建立起新的统一的上帝。这新的统一的上帝，我以为即是太一神。

秦朝的统治短促，汉初诸侯王跋扈，到汉武帝时才真正建立起统一的、中央集权的大帝国。恰恰也就在这时候，出现了新的上帝——太一神。《史记·封禅书》说：

毫人谬（《汉书》作“缪”）思奏祠太一方，曰：“天神貴者太一，太一佐曰五帝（‘太一’在‘五帝’之上）。古者天子以春秋祭太一东南郊（‘古者天子’云云，乃方士之托词自重，毫无根据），用太牢七日，为坛，开八通之鬼道。”于是天子令太祝立其祠长安东南郊，常奉祠如忌方。

接着又说：

其后人有上书，言：“古者天子三年一用太牢祠神三一：天一、地一、太一。”天子许之，令太祝领祠之于忌（缪忌）太一坛上，如其方。

从这里可见：在这一年以前是没有太一的。所以《封禅书》又说：

今天子（汉武帝）所兴祠，太一、后土，三年亲郊祠；建汉家封禅，五年一修封。

这是当时人、当事人记当时事，最属可信。

说太一之祀始自武帝，《汉书·郊祀志》中屡见不鲜。今只择取成帝永始三年（公元前14年）诏书：

盖闻王者承事天地，交接泰一，尊莫著于祭祀。孝武皇帝大圣通明，始建上下之祀：营泰畤于甘泉，定后土于汾阴，而神祇安

之，飨国长久，子孙繁滋，累世遵业，福流于今。
皆可见在汉武之前，绝无太一之祀。

“太一”之祀始于汉武，是新统一的帝国在天上的反映。“太一”统治了“五帝”，等于汉武帝统治了诸侯王。那么，在汉武之前，在战国时代，在人间尚未出现统一的人帝之前，是不应该有太一的。由此可见：《九歌》中无祭太一之歌，今本题曰《东皇太一》者，是汉人的误题。

也许有人会反驳：《文选》卷十九宋玉《高唐赋》里不是已经有“礼太一”的话吗？这不是战国时代已经有祭祀“太一”的明证么？我认为《高唐赋》、《神女赋》不是宋玉作的，而是汉武帝时代辞赋家所作。譬如这两篇赋的体裁，就是从汉武帝以后才兴起的，战国时代还没有这种赋体。又，从这篇赋的最后一句“延年益寿千万岁”看，哪里像是战国时代人的话，只有汉代瓦当文“延年益寿”才与之相若。

我们知道，屈原所作的抒情诗是有题目的，如《离骚》、《惜诵》、《抽思》、《哀郢》、《涉江》、《怀沙》以及《橘颂》、《天问》等等，皆是屈原的原题。《九歌》是屈原奉楚怀王之命而作的国家祭神乐章，与以上诸文的性质迥然不同，当初是否有题，大是疑问。我想：当初是没有题目的，因为乐工们人人皆知它是祭什么神的歌，是无需题名的。今本之所以会有这些题名，大概是汉代编集《楚辞》的人，也许就是刘向所加的。

刘向是一个相当迷信的人①，又是“拥护”太一神的人，看他对汉成帝说的话题及驳辩匡衡说的话即可知。他说：

且甘泉（按即祭祀太一、五帝之处）、汾阴（按指祭祀后土处）及雍五畤，始立皆有神祇感应，然后营之，非苟而已也！武、宣之世奉此三神，礼敬敕备，神光尤著。祖宗所立，神祇归位，诚未易动。

看他是如何地拥护对“太一”的祭祀！刘向是“宗室遗老，历事三王”

① 见《汉书》卷三六《刘向传》。

(宣、元、成,《汉书》卷三六《刘向传》载刘向对陈汤语),“居列大夫官,前后三十余年”,久居长安,深知汉宫中隆事太一:“神君(祭神时扮神之人)最贵者太一,其佐曰太禁、司命之属,皆从之。”(《封禅书》)他见屈原所作的祭神歌有《东君》、《云中君》、《大司命》、《少司命》等篇,又不知第一篇为迎神曲,不知篇中之“上皇”指楚怀王,因以此篇为祭祀太一之歌;又因长安城的太一坛在东南郊,而此篇又有“上皇”二字,遂拈合“东”、“皇”二字,杜撰出“东皇太一”的题名。其实,“东皇太一”这个名词本身就不通,既曰“东皇”(东方之帝),就不能称为“太一”(统一之帝);既曰“太一”,就不能称为“东皇”。

(原载《文史》1980年第九辑)